

# 先知的預言：由「飛碟會」事件談起

1998，丁仁傑未出版稿，若有引用請註明出處。

在 1997 年底，台灣發生了「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事件。在該事件中，有該會的一百多位信徒集體遠赴美國要等待上帝的降臨，當時這個消息馬上引起了台灣媒體與社會大眾一陣不小的軒然大波。

就信仰的角度來看，「末世論」與「天啟論」相結合的「千禧年」的盼望——也就是確切的預言上帝何時會再度降臨人間的一種信仰方式，一直是基督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傳統（註一）。因為聖經中清楚的記載著各種有關天國降臨的預言，當人們因面對周遭連續的災難而開始對人間感到失望，而又沒有擁有可以具體改造社會的工具或手段時，直接訴諸神明降臨的立即救贖的方式，的確是很能觸動人們內心深切的盼望和期待。也因此，每當社會動盪不安時，我們也不斷的可以看到各種預言上帝何時會降臨的波瀾壯闊的「千禧年」運動，在世界的歷史舞台上不斷的發生著。

這一類的運動，通常是由一位預言上帝何時會降臨的所謂的「先知」所領導。這位「先知」經常是一方面對於當前社會政治秩序的腐化與道德倫理的腐敗提出他深沈的批判，一方面也明確的指出未來新天新地降臨的時刻。這些「先知」們其實本來就不是理性的計劃者，而是嘗試要徹底改造未來的「烏托邦」的發揚者。也因此，我們對於這些「先知」們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本來是不需要對其加以逐字逐句的僵硬的去加以理解的。然而因為這些「先知」們經常明確的指出了一些在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的日期，包括了：世界災難降臨的日期、上帝降臨人世的日期等等；他們甚至是也預言了這些事件具體發生的實況，在這種情況下，「先知」們也等於是自己給自己設下了一個莫大的難題。預言的無法兌現將帶給「先知的宗教傳統」的傷害性是相當巨大的。

以這次「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事件為例，其領導者陳恆明就明確的預言了一系列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1、1998 年 3 月 25 日起，上帝將在達拉斯地區的電視台十八個頻道上親自「打廣告」，宣告上帝福音降臨。不過，這些「廣告」是只有在美洲地區才能觀看得到的。

2、1998 年 3 月 31 日，上帝會以人身出現於美國德州嘉倫市瑞治戴爾路三五五號，到時祂會以三種方式出現：穿越時空而來；出現分身；用各人的方言與各人交談。若屆時上帝未來，陳恆明也宣稱他到時願任由世人處置。

3、1998年6月後，若無上帝允許，飛機將無法自由進出美國。

4、1999年時，世界大災難將會發生，美洲人將在飛碟中度過44年，然後在2043年以後，美洲將與地球分開飛往火星，形成另一個與地球一樣的地方（註二）。

而陳恆明也一再強調這些訊息都是來自於上帝的啟示。

由於1998年3月25日（預言上帝將登台「打廣告」的日子）和3月31日（預言上帝將實際降臨人間之日）很快就會到了，陳恆明的預言也很快將要面臨考驗。他自己也說道：「如果預言沒有發生，就證明我們的信仰是假的，當天吃過中飯以後，大家就可以買機票回台灣，『真道』也當然就解散...」（註三）一般媒體與大眾也相信，一旦該組織「教主」的預言失敗，該組織自然也就馬上壽終正寢，不再有任何可以吸引信眾的魅力存在了。

不過事實上，既然「先知預言」的宗教團體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長遠傳統，「先知」的預言未曾實現的這樣的一個結果，當然也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場景。由歷史上的紀錄來看，是不是這些「先知」的跟隨者們，在「先知」的預言失敗以後，在面對著斬釘截鐵的否定了「先知」預言的事實出現時，對「先知」的信仰就會完全的瓦解呢？這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讓我們先來看幾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一個例子是西元二世紀時的一個基督教的教派——「孟特尼教派」（Montanism）。據載：

孟特諾斯（Montanus），在西元二世紀中葉時出現...，他當時確信上帝第二次的降臨馬上就會發生，並且預測祂會降臨在潘普拉（Pepuza）這個地方，他宣稱所有真正的信仰上帝的人都應為祂的降臨來做準備。他說明他的理解是來自上帝的啟示，由於他先知般的性格和高貴的態度，使他開始有了廣大的信徒。而潘普拉這個地方，當時也因大量人物的湧入而成為了一個新的市鎮。然而先知的預言後來並沒有發生。但是，這並沒有使這一個宗教運動停止了發展；相反的，它反而帶給基督教的菁英份子一套新的生活的形式，也就是自此，他們可以直接借重聖靈的啟示，而不再需要靠其它的權威來引導他們的宗教生活了（註四）。

一個更有名而且歷史記錄更完整的例子是出現在十九世紀的「米勒教派」。米勒（Miller）是一位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農夫，在1818年時他宣告，根據聖經，世界末日將會在1843年時來臨。大眾對他的預言相當注意，到了1840年

時，米勒的信眾已經匯集成一股廣大的群眾運動了。在 1843 年的 1 月 1 日，米勒正式宣佈基督將在猶太曆法上的 1843 年 3 月 1 日到 1844 年 3 月 1 日中的一天，與其聖徒們共同降臨人世。一些米勒的信徒也開始猜測著更具體的上帝降臨的日子，雖然未經「教主」背書，不過在該組織中，當時普遍的流傳著，1843 年的 4 月 23 日，上帝將會降臨人間。結果到了那一天，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據載，當時信徒們有著這樣的反應：

首先，米勒的信徒們是失望的，可是很快的，他們又恢復了信心。他們互相提醒著，還有一年可以等待，上帝真的是馬上就要來了。信徒們於是又興奮的歌唱著、慶祝著，情緒異常激動著（註五）。

這之後，米勒的信徒們又把希望放在 1843 年的 12 月 31 日，不過這一天又是平靜的過去了，米勒於是向大眾宣告：

弟兄們，羅馬曆法上的 1843 年已經過去了（猶太曆法的 1843 年要到當時羅馬曆法的 1844 年春，才算過完 1843 年），我們的願望卻仍未實現，我們要放棄等待嗎？不，不，.. 我們不相信我們計算的日期是真的到了最後一天...（註六）

於是，米勒又再次計算了一次，並且認定 1844 年的 3 月 21 日才是真正的上帝降臨之日。結果一直到了 1844 年的 3 月 21 日那一天，上帝依然沒有降臨。這樣的一個結果，對於非米勒信徒的旁觀者而言，倒是一個好消息，他們對於米勒信徒們的嘲弄當然是極盡尖酸刻薄的：「什麼？還沒出現嗎？我們以為你們已經出現了，不是很快就出現了嗎？你們的老婆是不是也失蹤了再也不管你們了？」（註七）而米勒的信徒們呢？的確，過了這一天，他們是極度失望的。但是，這種沮喪為期並不很長，他們很快的就又打起精神來了，而且是比以前更狂熱、更積極。教內又開始流傳著新的推算出來的上帝可能會降臨的日期了。

很快的，到了 1844 年的夏天，該信仰不但沒有瓦解，反而得到了愈來愈多的信徒。許多農民們也不再耕種了，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末日在即，再耕作恐怕也是等不到收成了。就在這個時候，「米勒教派」的信徒們又找到了一個新的上帝可能降臨的日期：1844 年的 10 月 22 日。早先幾次的預言失敗，並沒有打垮信徒們的信心，反而使得信徒們更興奮、更激動的期待著上帝真正的降臨。如同當時的雜誌上所說的：

許多信眾跑出去警告著外面的弟兄們，在費城有些人自動向外傳佈著上帝就要來臨的消息。在紐約和費城，許多商店都關門了，他們都跑出去向外傳揚天主就要來臨的消息...（註八）

當時許多人也都變賣了家產，全心的等待著這最後的救贖的到來。不過當這最後的一天到來，可是結果卻仍然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這對米勒的信徒們終於造成了心靈上莫大的打擊。一位信徒說道：

我們最殷切的期待和盼望破滅了！我從未經歷過如此的悲傷，我們似乎是失去了世間所有的朋友，我們哭泣又哭泣直到天亮。我在心中對自己說，這一段經驗是我在我一生的基督徒的經驗中最豐富也最光明的一段經驗，如果這些被證明是錯的，那我其它的基督徒的經驗又算是什麼呢？難道聖經也會是錯的嗎？難道沒有上帝、沒有天堂、沒有天國的存在嗎？那麼我們實在是太難過了，如果我們所有殷切的期盼都落空了，那我們只有日夜啜泣了。（註九）

另一位信徒說道：

10月22日已經過去了，對於我們這些信仰和盼望的人來講，心中是有著說不出來的沈痛的，但是對於那些不信和邪惡的人來講是乘心快意的。所有這些都停止了，雜誌也停了，正式的聚會也沒了，每一個人又回到孤伶伶的感覺裡了。什麼話也不想說了，世界又變成了一個冷冰冰的世界。沒有神的消息，上帝沒有來！對我們這些相信上帝會降臨的人們而言，內心的痛苦是筆墨難以形容的...（註十）

這一次，這最後的一次預言的失敗，終於使得「米勒教派」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而逐漸的瓦解了。然而我們注意到的是，由其第一次預言的失敗，一直到它第四次的預言失敗，「米勒教派」一共經過了十八個月才開始真正的瓦解。頭幾次預言的失敗，不但沒有減弱信徒們的狂熱，反而是使得信徒們的期望一次又一次的不斷的升高，終於達到了1844年10月的一個最高峰。而在最後一次的預言也失敗以後，一直到1845年的春季末期，這個團體才真正的逐漸的從歷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註十一）。可是這個團體雖然是消失了，我們也不難想像的是，它所曾經帶給追隨者的心靈上的感動和信仰上的震撼是相當巨大的，就如同前面兩位米勒的追隨者的話中所顯示出來的，這些經驗是他們做為一位基督的體驗中，永生難以忘懷的一段回憶。

以上的這些歷史案例，事實上正充份的展現出了「信仰」的性質。信仰的基礎經常是沒有確切的經驗上的證據的，對所信的信仰沒有任何懷疑，也常是人們求道的過程中必經的心理過程。更何況在基督教的傳統中，信，正是獲得救贖的最重要的門徑。正如聖經上所說的：「信靠的人必不著急」（以賽亞書 28.16），「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安穩」（以賽亞書 7.9），「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後沈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希伯來書 10.38-39）。也

因此，對「教主」的不可懷疑，也常構成了宗教團體對信徒的一個重要要求。於是，一個宗教團體的「先知」，在外人的眼光中，卻常會覺得他是一個騙徒。如果我們不能由宗教的特殊傳統和信徒的觀點來看待一個宗教團體，那是很難去理解各種宗教活動的具體意義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就一個常人的角度來看，一個我們在此感到相當好奇的問題是：當「先知」預言失敗的時候，信眾們難道不會馬上遠離他而去嗎？這些信徒們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呢？他們在內心裏到底會怎麼樣的去調整信仰與事實間的差距所造成的心理衝突呢？

事實上，這些問題也正是在 1960 年代有名的社會心理學家費士亭格等人（Festinger, Riecken, & Schachter）所曾經關注過的一些問題。而他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對當時美國中西部一個「飛碟會」組織的實際參與和觀察所獲得的寶貴資料，也正構成了他們後來發展出來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認知失調論」--的強而有力的經驗上的證據（註十二）。

費士亭格等人的研究最早是起源於一則 1949 年 9 月地方報紙上的一則小新聞。這條新聞的標題是：外太空傳達給一位郊區居民的訊息，來自外星的先知「克萊里」對市民呼喚著：逃離洪水，12 月 21 日我們即將被洪水淹沒。這個新聞寫道：「根據一位郊區家庭主婦之言，大湖城在 12 月 21 日即將被大湖所淹沒，瑪麗安.克區女士...她說她自己並不是先知，而是在書寫過程中，不自主的寫下了這些外界傳遞而來的訊息。這些訊息，據克區女士宣稱，是來自一個叫做『克萊里』的星球上的高等生物!『他們』曾以飛碟造訪地球。克區女士說，『他們』在造訪中發現了地表的斷層線，而這即將造成大洪水。克區女士說，她被告知洪水將由北極圈一直覆蓋到墨西哥灣，而形成一個新的海洋。在此同時，她說：大災難將由美國西岸的西雅圖一直淹沒到南美的智利。」（註十三）

這一則地方新聞馬上就吸引了費士亭格等位學者的注意力，因為他們當時正在發展中的「認知失調論」的主要內容，也就正是要研究當人們所接觸的外界事實違反了原有的認知內容時所可能會有的反應。費士亭格等人認為，這一個「飛碟會」的預言，一定會面臨到預言失敗的挑戰，因此由對於其信眾在預言失敗後的反應裏，我們正可以看出人們在真實的生活中，當心理上產生「認知失調」時所可能會有的調適之道。

基本上，「認知失調論」者認為，人們的認知結構有維持平衡的傾向。我們對一個事實的理解，代表的是一個「認知元素」，如果在人們的心中，兩個「認知元素」之間有明顯的衝突和矛盾存在，則其就會處在一種「認知失調」的狀態。「認知失調論」者認為，這種狀態是一種很不舒服的狀態，因此人們也會有許多

後續動作來化解內心這種不舒服的失調的狀態。這些動作可能包括了，改變其中一個「認知元素」的內容、或是加進新的「認知元素」使認知結構再趨於平衡。譬如說，當一個有煙癮的人在面對了抽煙會致癌的研究報告時，他或者會戒煙、但也更可能會認為此研究的結果不正確、舉出其他的抽煙不會致癌的研究來做說明、或是更強調抽煙的其他好處等等，以來化解心中的「認知失調」的處境。

而宗教信仰者在面對具體的否定他們既有的「認知元素」的新的「認知元素」時，他們顯然的也是面臨了一個強烈的「認知失調」的處境的。那這個時候這些信徒們會怎麼辦呢？這正是費士亭格等幾位學者所關心的問題，一旦逮到了現成的觀察的機會，在隱藏其研究目的的情況之下，他們於是立刻的就與這個團體「飛碟會」聯絡上，並且成為了該團體的成員，嘗試對該團體在預言失敗後信徒們的反應做進一步的現場觀察。而他們也馬上知道，這個團體的領導者克區女士除了預言 12 月 21 日的大洪水以外，也預言 12 月 20 日的午夜，外太空來的飛碟將會下降拯救這些參與了這個「飛碟會」的信徒們脫離洪水的困境。

到了 12 月 20 日的午夜，十多位「飛碟會」的信徒們焦急緊張的等待著，一直到午夜已過，卻始終沒有半點訊息。費士亭格等人的書中寫道：這時大家都目無表情，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克區女士終於說話了：「『造物者』宣佈計劃仍然繼續，但會有一點點遲延。」這時有幾位記者忽然打電話來詢問結果，信徒們的回答是：「不予置評，我們無可奉告。」一直到清晨四點，克區女士開始哭了起來，她向周圍的信徒們說，她知道大家已經開始不相信她的話了。一直到了清晨 4 點 45 分，她進了屋裏一會然後又滿臉容光煥發的走了出來，並向全體在場的人說，她由「造物主」處得到了一個新的訊息：

從今天起，這一個事實是再確定不過了，地球上只有一位真神，而祂就活在我們的中間。透過了祂的手，寫出了這些話語來，神的話是全能的，透著祂的話你們已經得救了，在祂的話中你們由死亡的口中被救了出來...（註十四）

這樣的信息在這個小團體間馬上被熱烈的接受了，這些「飛碟會」的信徒們於是開始相信，正是他們的虔誠等待取悅了上帝，並且挽救了這一場災難。而緊接著而來的舉動是，雖然這個團體原先並沒有向外公開的招募信徒，不過現在當他們認定是他們的信仰拯救了地球以後，他們對外界忽然充滿了信心，決心要向外把「福音」傳給更多的人了。正如同其領導者克區女士當時所說的：「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候了！」而後，這個團體的參與者們於是開始向外展開了更公開、更積極的傳教活動。雖然最後，這個團體終究還是逐漸瓦解了，不過費士亭格等人發現，使這個團體瓦解的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信徒們在預言失敗以後自動的放棄了他們的信仰，反而是因為該團體在預言失敗以後面臨了外界更

強大的壓力和敵視(警察的干涉、參與者們被親戚朋友視為是精神失常的人、工作上的被解聘等等)，而使得該組織無法繼續再發展了。

換句話說，費士亭格等人根據他們的觀察發現：

人們的機智和智慧不僅是使他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信仰而已。一個人若全心的信仰一件事情，並曾為這件事情有過真正的付出，他事實上已經是因此而產生了一種無可回復的舉動了。現在，假如有了明確的、難以否定的，可以證明他的信仰是錯誤的證據擺在他的眼前，那麼接著會發生些什麼事呢？事實上，這時通常一個人不但不會動搖他的信仰，可能反而會比以前都還要更強的堅持著他的信仰，更且，他可能會表現出更強烈的想要向外勸服他人來接受他的信仰的熱情（註十五）。

也就是說，在有堅強的信仰的條件下，當人們因面對了外在明確的否定信仰的證據而產生「認知失調」時，通常並不會採取改變信仰的方式來獲得認知的和諧，而是用更堅強的信仰和更積極的傳教活動來取得一種心理上的平衡。

那麼為什麼一個人的信仰是那麼的難以改變呢？這最主要的原因有幾點(註十六)：

第一、信仰對個人而言，是一件很有收穫的事情，它提供了個人生命的意義，也提高了個人生命的尊嚴。一個人由信仰中所能夠獲得到的深刻感受，通常是在其它的事物中所得不到的。

第二、一位虔誠的信仰者，通常也有許多機會在公眾場合中公開他的宗教信仰、參與各種宗教活動、或者最起碼他的親戚朋友們也多半會注意到他的宗教信仰。一個人在經過了這樣子的公眾暴露之後，要再向別人公開承認他的信仰是錯誤的，這是不太可能的。

第三、一個人的虔誠的信仰，很少是在隔絕的情境中產生的，而通常是在一群信仰類似的信徒當中彼此互相感染和支持中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旦人們面臨了信仰上的挑戰，同一個信仰社群中的人將會彼此互相支持，而刻意的忽視外在的不利於信仰的訊息。

因為信仰有著這幾種特性，因此人們在面對不利於自己的信仰的訊息時，是不會輕易的更改他們的信仰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學者發現，人們通常會採取四種方式來獲得認知狀態的平衡（註十七）：

1、信徒將直接避免去再接觸會讓自己產生「認知失調」的因素：譬如說盡量只與自己宗教社群中的人做接觸而與外界隔離開來，並儘量不面對外界的新的消息等等。

2、更積極的做法是團體成員間的互相支持：一群有著共同信仰的人彼此可以互相支持彼此的觀點，同時他們也會嘗試努力向外宣傳團體內的觀點，來尋找更多的共同信仰者的加入。而若能夠找到更多的新的信仰者的加入，這顯然也更是證明了信徒原本的信仰的正確。團體成員間的相互支持和繼續向外的傳教的活動，是一種最有效的化解「認知失調」的辦法。

3、解釋架構的更改：在面對新的否定信仰的證據存在時，在不改變信仰的前提下，對於信仰內容或是否定的證據再做一些新的詮釋，使得外界事實和信仰之間不再有明顯的矛盾存在。尤其宗教團體的領導者經常懂得如何提供合理化外在事件的系統性的說辭，譬如說宗教團體的核心幹部可能會出面說明：聖經上的預言可能是另有所指；世界末日災難的未來臨是因為大家真心禱告而加以化解了等等。尤其「末世思想」在基督教中有長遠的傳統，不同的聖經詮釋者，曾以各種方式詮釋聖經中的預言和表徵，宗教領導者在預言失敗的時候，是可以根據過去各種聖經詮釋，重新出發，對於外界事實與聖經的預表再做一番新的預言或詮釋的。

4、訴諸信仰，是更直接的化解「認知失調」的方法：宗教領導者只要不斷強調：「只有信心才能夠使靈魂得救！」，就能夠化解信徒心中的懷疑和「認知失調」，甚至能夠喚起信徒心中更強烈的宗教情操。

那麼，回到我們所關心的台灣的「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的事件中來。陳恆明的第一個預言，上帝將在達拉斯地區的電視台十八個頻道上親自「打廣告」的日子：1998年的3月25日，也很快的就要到了。就該教派的成員來講，他們當然是主觀的希望其「先知」的預言能夠實現，並且他們自己也因此可以獲得永恆的救贖。不過，根據過去的歷史紀錄，世界末日和上帝降臨的預言是從來沒有真正的實現過的。那麼假設陳恆明的預言失敗了，該組織的信徒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當然，因為筆者並沒有對該團體做過任何實際觀察或是訪談，對許多問題在此於是只能以假設性的語氣來談一談。首先，我們可能必需要知道，該會的參與者到底對「先知預言世界末日的聖經傳統」有著多強的心靈上的追隨？在我們的這一個社會中，這一個傳統到底能夠獲得多大的共鳴？「飛碟會」的教義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教義為主，而再融合了一些佛教教義，和一些關於磁場的現代語彙的一個綜合性的產物（註十八），這樣的一種教義所吸引的信徒們，會是

一些什麼樣的人呢？在這種教義引導之下的信徒們，是否對於上帝的下凡會真的如此執著呢？就如同一位信徒所說的：「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賭局，我用四個多月的時間、七萬美金賭一個『永生』，有什麼不好？」（註十九）這裡面似乎已經看不到對上帝虔敬渴望的那一種色彩了。換句話說，我們可能必需要知道，該會的信徒們到底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加入該組織的？他們投入「飛碟會」的信仰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入呢？「信仰」在他們參與「飛碟會」的動機中到底強到什麼程度呢？如果他們參與的本來的出發點並不是堅定不移的，那麼，當信仰遇到否定的事實存在而產生「認知失調」時，那當然信徒們是有可能改變或放棄其信仰的，就如同報載該會的某些信徒所表示的，如果預言失敗了：「沒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有的要到別的地方繼續讀書、深造，有的要雲遊四方追尋真理。有的說，「那就回台灣嘍」...（註二十）

同時，有趣的是，當東方人面對「認知失調」時的反應是否會和西方人一樣呢？跨國研究曾經發現，西方人通常是有著較大的想要試圖讓認知狀態維持平衡的心理衝動的，反之，東方人，以日本人為例，他們不但是習慣於處在事實與行為矛盾的各種狀態之中，而且在其文化和教養模式之中，那種能夠忍受各種事實間矛盾的性格，還常被當做是一種人格成熟的表現呢！（註二十一）那麼我們台灣人，又是否是有著巨大的忍受「認知失調」的「修養」呢？如果是的話，那麼「飛碟會」的信徒們在面對預言的失敗時，是也有可能只有著平淡的反應的。

當然，對於該會的核心人士和對其堅信不疑的信徒來講，「認知失調」的經驗可能還是相當痛苦的。如同我們已經講過的，根據「認知失調」論，他們可能會有四種進一步的反應：

- 一、避免外界接觸，盡量不面對外界的消息；
- 二、團體成員間更密切的相互支持打氣，等到有足夠的信心，還有可能向外從事進一步的傳教活動；
- 三、對原來的預言做重新的詮釋，或者說預言的日期延遲了，或者說信徒們的虔誠警醒了世人並且也化解了世界的災難；
- 四、領導者或許會再一次的向信徒強調，對上帝的啟示與考驗要有信心，這一切都仍然是在上帝的計劃之中的。

當然，在強大的社會壓力和媒體的渲染之下，信徒們也不見得就能夠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適度的產生這些反應來調整內心「認知失調」的狀態。反之，外界對一個預言團體預言失敗後所產生的巨大壓力，通常是這類團體的核心信徒們所難以承受的，這往往會導致這類團體走上瓦解之路。於是我們將會看到的是，這種外在的社會態度與文化環境，將會進一步決定一個預言團體在預言

失敗以後的命運和可能的發展方向。

## 註釋

註一：參考 Cohen, N., 1961,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二：見中國時報 86 年 12 月 24 日 7 版所載。

註三：同註二。

註四：見 P. Hughes, 1954,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p.10, 轉引自 Festinger, L., H.W. Riechen, & S. Schachter, 1964, *When Prophecy Fail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Pp.6-7。

註五：見 Sears, L.E., 1924, *Days of Delusion-A Strange Bit of Histor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p.119, 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Schachter 前揭書 p.16。

註六：見 Nichol, F.D., 1944, *The Midnight Cry, Tacoma Park, Washington, D.C.:*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Company, p.160n, 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Schachter 前揭書 p.16。

註七：見 Sears 前揭書 p.144, 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Schachter 前揭 p.17。

註八：見 Nichol 前揭書 p.238 中所引之 *The Midnight Cry*, 雜誌 October, 1844:104。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之 p.21。

註九：見 Nichol 前揭書 Pp.248-249 中所引之 Hiram Edson, fragment of ms. on his life and experience, Pp.8-9,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之 p.22。

註十：見 Nichol 前揭書 Pp.248-249 中所引之 Luther Boutelle, *Life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Pp.67-68, 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之 p.22。

註十一：見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之 p.23。

註十二：參考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

註十三：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 Pp.30-31。

註十四：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 p.169。

註十五：引自 Festinger, Riechen, & Schachter 前揭書 p.3。

註十六：參考 Batson, C.D., P. Schoenrade, & W.L. Ventis. 1993.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21.

註十七：參考 Carroll, R.P., 1979, When Prophecy Failed,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Pp.86-110。

註十八：參考陳恆明，1996，神佛世界的實證研究——上帝的救贖與栽培，嘉義縣六腳鄉：作者自行出版。

註十九：見中國時報 12 月 22 日所載。

註二十：見中國時報 12 月 22 日所載。

註二十一：參考 Iwao, S. 1988, Social Psychology's Model of Social Behavior: Is it not Time for West to Meet the Ea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Sdney, Australia. Hong, G.Y. 1992. Contributions of "Culture-Absent"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to Mainstream Psych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anta Fe. 轉載於 Moghaddam, F.M., M.T. Donald., & S.C. Wright. 1993. Social Psychology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W.H. Freeman & Company. p.12。也參考 Hiniker, P.J. 1969. Chinese Relations to Forced Compliance: Dissoance Reduction or National Characte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7:157-176.對中國難民的受試者所做的類似研究。